

# 我需要帮助

美国《洛杉矶时报》2003年9月11日文章

本报记者：Evelyn Iritani

## 一. 当斯坦福商学院的校友们收到一封来自被关押在中国的同学的电子邮件后，他们马上就行动了

这封题为“一个无辜的美国公民呼吁中国司法公正”的电子邮件是2002年9月24日到达的。

在长达五页的邮件中，邵裘德讲述了他正在经历的这场莫名其妙的、不可思议的人生恶梦。在受到莫须有的罪名指控后，在受到用编造的证据和凭空捏造的“供述”进行极不公正的审判之后，他被以偷税罪判处十六年徒刑，投入中国的监狱。

“现在，在遭受了四年多的秘密迫害之后，我终于能够第一次把我所经历的这个恐怖的，极其不公正的悲惨故事告诉外面的世界，”41岁的邵裘德写到，这封在上海青浦监狱中写的邮件被发给了三百多名1993届的斯坦福商学院同学们。

同学卡罗兰（Caroline Pappajohn），是旧金山的一个小型公益机构的管理者，她以前和邵裘德并不是很熟，可是从打开这份邮件后，她却越读越气愤，而当时有这种感觉的并非只有她一个人。

接下来的几个小时里，表示愤怒和对邵裘德处境担忧的电子邮件像雪片般的飞来飞去。包括卡罗兰在内的许多同学都纷纷志愿帮助，这些电子邮件最后都转到了另一个同学胡拂（Chuck Hoover）的手中。胡拂是邵裘德在斯坦福时的室友，今年39岁，在洛杉矶某公司任市场总裁。

在这之前，胡拂和另一个同学，迈可（Michael Smith）一直在想办法帮助他们的密友邵裘德，他们知道邵裘德管理的一家公司在中国遇到了麻烦。1998年4月被逮捕后，邵裘德在2000年12月终于设法向他们发了第一份简短的电子邮件，而那时，他已经被定罪判刑了。他们同美国驻上海的领馆以及邵的律师联系，但都很不顺利。

胡拂感到无从入手。他对中国及中国的司法系统完全不了解，他担心如果披露此事会让他的朋友难堪，或者激怒中国政府。他知道中国的有关当局曾要邵裘德“耐心地”等待事情的转机以及不要同媒体接触。

“也许一个国际大丑闻正在你的眼前发生，”邵在给同学们发电子邮件前给胡拂这么写道，但我感到孤立无援，要赢得公正唯一途径就是把事情完全公开，你能不能帮助我？”

拥有全国最著名的商学院之一的斯坦福大学。座落在硅谷的中心，是那些满怀雄心壮志的未来创业者和企业家的摇篮。从商学院毕业的十年后，许多邵的同学们都已拥有家庭、货款和优厚的收入。

对他们来说，中国只是一个有肯塔鸡炸鸡连锁店、手机和越来越高效的生产装配线的高速发展的国家。

但是邵的邮件来到了他们的信箱中。

卡罗兰有着在世界各地销售电讯软件的工作经历，所以她知道在中国工作是相当有挑战性的，尽管如此，她说，她还是不能想象如此不公正的事情还会发生。

“在商业活动中受到干扰、阻碍和其他困难是一回事，”现年37岁，从事帮助有困难的年轻人找工作的卡罗兰说道，“但为了坚持商业道德和人生准则而牺牲十六年

光阴在监狱则是完全不同的另一回事。”

深夜里交换大量的电子邮件后，胡拂和卡罗兰很快同意最好办法是让美国政府加入战斗，但是首先，他们需要一份概述这个复杂事件的书面材料。

“我们首先想到的是应该通过华盛顿来寻找办法，”在考入斯坦福商学院前曾为参议员Arlen Specter工作过三年的卡罗兰说“但很明显，这是一个相当复杂的案子，我们要想办法让大家了解整个事件。”

邵已经为他们做了大量的工作。被送到青浦监狱后，他立即开始申诉。他请他的姐姐静娴，一个在上海的医生，在每月的探视时为他带去公司的文件和法律书籍。有一段时间，邵在帮助监狱做些事情时有机会使用电脑，发送电子邮件，但很快这些特权就被剥夺了。于是他用手写材料然后请她姐姐或美国领馆官员帮他发送电子邮件。监狱派官员专门监控他的来往信件。

使用邵提供的材料，胡拂写了份“白皮书”，后来成为整个运动的关键材料。

## 二，幸运的时机

邵是上海商人之家的第四个孩子，在中国改革开放之初他从上海交通大学计算机系毕业后度洋留学，在1996年他来到波士顿，并在Digicom Computers公司谋得了一份职位。

几年后他被斯坦福商学院录取。在学校的二年间，他同胡拂等数位同学成了密友，他们一起打高尔夫，看电影和到俱乐部玩。

将毕业时，邵向同学们展示了一份他精心设计的到中国设贸易公司的商业计划，他的游说有相当的说服力，十六位投资者之一的亚历山大(Alex Muromcew)说，投资者至少投\$5000。

“这是一个我熟悉、喜欢和相信的人，”38岁在旧金山做基金管理的亚历山大说，“我知道他很聪明，家在上海，看来.....如果有人会成功的话，他一定会是其中的一个。”

毕业后，邵拿了一百万元的种子基金分别在旧金山和上海成立了希比威贸易公司。由于中国简陋的医院急需现代化，他专注于医疗器械的业务，到1997年，他有15个职员，每月销售额超出\$100,000。

那年夏天，上海的税务检查官员来到他的办公室声称“税务特别检查”。拿走了公司的帐册，据邵说，几天后，一个说税检队长要邵支付人民币50万元，约\$60,000，来终止税务检查，邵拒绝后回到美国，去参加入籍的正式仪式。

随后的十个月中，邵多次往返中国，他同税务官员见面但仍坚持拒绝付钱，1998年4月，警察把他拘押后带到一个偏僻的小旅馆，盘问了五周后把他送到上海市拘留所，在那里他被与世隔绝地关押了二十六个月。

某些人声称代表上海市公安局向邵的家属索要人民币30万元，约\$36,000，说这样就可释放邵，但邵的家属拒绝了。1999年5月，有关当局指控邵偷税和虚开发票，他被送到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受审。

邵说由于他在旧金山也有帐册，所以他有付给进口商的关税和增值的付款凭证。他认为那些进口代理商，其中之一是上海市公安局所拥有的公司，把他支付的税款侵吞了，事发后却嫁祸于他。

中国的司法系统一直是共产党执政的工具之一，法律专家们认为，该系统现在有很大的改进但仍存在严重的缺陷。许多法官缺乏基本的法律教育，使得他们容易腐败。尽管审判应该是公开的，但一些重大案件，尤其是政治性的或涉外的，常常是不公开的，嫌疑人有权请律师，但往往发现很难请到一个律师，因为如果案件有争议，那么刑事辩护律师就担心受恐吓和报复。

在美国领馆的帮助下，邵在开庭前一周终于请到了一位律师，但没有被允许同律师交谈，甚至在庭审时也没有被允许同律师交谈。尽管如此，邵说他的律师，段祺华辩护得相当出色，指出指控是荒谬的而证据是微弱的，但公诉人却说邵在单独禁闭时曾认罪了，但邵却坚决地否认。

9个月后，法院认定希比威公司犯偷税和虚开发票罪后判邵入狱，段律师提起上诉，但却不允许向法庭递交辩方材料，上诉随后被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驳回。

2002年1月，邵向国家最高审判机关，最高人民法院申诉，但这个行为也被拒绝了，随着法律途径的消失，他转向了他斯坦福朋友们。

胡拂和卡罗兰要求斯坦福校友们一起行动。几十位年轻的律师、企业家和银行家拿出了他们的通讯录，寻求帮助，他们向国会议员们写信，发电子邮件，到各种会议上寻找有关中国法律专家，请在大公司企业的朋友和商业伙伴们向中国和美国的最高级领导人写信。

“这就象创设公司一样，”在洛杉矶的一家网上购车公司任高级总裁的胡拂说，“你要做的就是给人家材料，让人家相信你，然后做下一步的工作，这样一直前进。”

邵的故事逐渐地在斯坦福校友的范围之外传播开来。出生于爱荷华州的卡罗兰，请她的叔叔去找叔叔的朋友，爱荷华州的众议员，众院东亚和太平洋地区国际事务委员会主席詹姆斯先生向中国驻美大使杨洁篪写了一封信，随后，十多位其他国会议员，包括众院少数党领袖南希·佩罗兹和加州资深参议员戴安·费因斯坦、民主党总统候选人约翰·凯利参议员等都写信要求释放邵或者对案件重审。

### 三，一位新的支持者

卡罗兰又设法邀请了一位著名的中国人权活动家康原( John Kamm )来参加私人午餐会，康原先生帮助过数百位被关押在中国的人，绝大多数是政治犯，他每年向中国政府递交一份“被关押者清单”，在他的帮助下，一些人被提前释放，一些人被减刑。康原先生同意看一下邵的案子。

“他也许是我们的关键武器，”兴奋不已的卡罗兰当晚在写给胡拂的电子邮件中这么说。

康原加入到了邵的支持者中。“从我经手的几百个成功故事来看，它们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有专心致力于释放某人而设立的组织或个人，”总部设立在旧金山的对话基金的人权活动家康原说，“而斯坦福校友们的这个组织是我所见过的最专心致志、最具职业水平的一个。”

邵是目前被关押在中国的50~60个美国人之一，他们中的半数以上都涉嫌经济罪名，据康原讲，几乎所有被关押的商务人员都是美籍华人，因为他们的语言能力和文化背景，使得他们往往卷入一些风险高的行业中。法律专家们都认为这些美籍华人不像白种的美国人那样容易引起国际风波。

斯坦福毕业的校友蓝安女士( Lang Anh Pham )，一个在硅谷工作的市场总监，完全理解为什么像邵这样的人容易遇到麻烦。几十年前她全家从越南共产党手中逃到美国，开始了崭新的生活，“我给裘德发电子邮件说，我可以想象自己也处于你的处境的情况”，她说。

蓝安女士在工作和照顾二个孩子的同时，把邵的情况向媒体作披露，她的第一个努力就是在邵的斯坦福校友十年团聚会上，组织召开了有一百多位同学参加的新闻发布会。

康原在会上向大家讲述了周先生的故事（David Chou）。周先生是一位住在洛杉矶的退役飞行员和创业家，他1994年被以诈骗罪拘留后判刑十五年，去年九月，经过幕后大量活动，在布什总统与中国的江泽民主席会面前夕他被释放了。

“某一天，某位高官将去那里或者那里的某位高官将来这里，这时双方政府就会讨论有关的‘可交换物’，”康原在斯坦福的新闻发布会上说，“你们要努力使邵裘德成为这样的‘交换物’。”

会后大家议论纷纷，二位校友帮助设立一个网站，<http://freejudeshao.com> 把邵的法律努力全部公诸于众，第三位校友，提出以投资者名义起诉中国政府，亚力山大和其他人以前也考虑过这个选择。还有几位志愿者说把网站译成中文。

感谢蓝安的努力，新闻发布会后媒体发了一系列的报道，几家全国的电台以及一些本地的电视台都播放了新闻，邵的老朋友，以及从未谋面的陌生人，都纷纷伸出援助之手。

在法律途径方面也有了进展。在听到邵的情况后，著名的中国法律问题专家柯恩（Jerome Cohen）教授，到美国驻上海领事馆去了解邵的案情。

胡拂安排让在纽约大学做教授的柯恩教授先生同邵的姐姐见面。

与此同时，邵在监狱后仍孜孜不倦地努力，当他听到北京的大学有做案件专家论证时，他请他的家人——尽管已经为案件花了高额的费用——又花了\$10,000去请了六位中国著名的刑事法律专家，包括一位前最高法院的法官，来对他的案件作分析。

5月份，专家意见书认为由于原判中警察提供的论据可疑以及有新的证据，本案应予重审。在给胡拂的电子邮件中，邵说他感到“终于被证明是清白的和松了一口气，”随后邵根据专家意见书又发了一份上诉状。

柯恩教授认为专家意见书对原判决的否定是一个“令人惊讶的进展，”将给中国的最高法院法律上依据来否决上海法院的判决。

专家意见书发布后不久，柯恩教授拜访了他以前的一位学生，现任美国驻华大使雷德先生，在晚餐上，两人讨论了邵的案件。

六月份，雷德大使在给大奥玛哈地区商会的一次演讲中，介绍了中国从1974年他第一次访问以来的巨大变化，而当时“随处可见的高音喇叭里不断地在号召广大人民群众起来打倒帝国主义和资本主义这二个魔鬼。”

但是雷德大使说中国还有许多工作要做，尤其是在司法系统方面。他给出了数位美国政府正在努力使中国释放的被关押者名单，其中就有邵裘德。

在邵向他的校友们发出那封电子邮件的九个月后，美国政府正式出面了，“我们都感到很兴奋，我们的努力终于有了初步结果，”胡拂说，他一直每周至少要花十个小时在邵的运动上。

还有更多的好消息。美国领馆官员告诉邵说美国大使馆正在准备发一份正式的外交照会，美国大使馆的一位官员没有对照会的具体状态予以确认，但说美国已在“数个场合”向中国政府提出了邵的案件。

上个月，中国最主要的法律报纸，“法制日报”，报道说最高法院要在九月底前

清理所有的积案，一个美国政府官员告诉胡拂说美国政府希望邵的案件是其中的一个。

上海的警方和法院拒绝对此案作评论。

自从被捕以来，邵忍受着高血压和背疼的折磨——这个健康因素常常被用来作为提前释放的理由，但邵拒绝走这条路。

“我赞赏邵的勇气”，他的法律顾问柯恩教授说，“一般来说，刑事律师的第一个直觉就是先把你的客户弄出来，然后再考虑证明他的清白无辜，但裘德却情愿先证明他的清白”。

对斯坦福商学院93届的校友来说，工作还在继续。

“由于某些原因，我感到很乐观”，胡拂说，他的三岁女儿凯蒂（Katie）每晚睡前都要为邵祝愿一次，“也许这只是错觉或天真的，但我认为我们最终将把他弄回来。”

（张学英（Zhang Xueying）对本文也有贡献）

进一步查询如下：

[http:// www.freejudeshao .com](http://www.freejudeshao.com)

An American Innocently Imprisoned in China

C 310-895-0849

Charles Hoover